

先秦文学与文化

第四辑

赵逵夫 主编

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先秦文学与文化

第四辑

赵逵夫 主编

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文学与文化. 第4辑 / 赵逵夫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325-7890-0

I. ①先… II. ①赵…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先秦时代—文集②文化史—中国—先秦时代—文集
IV. ①I206.2-53②K2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450 号

先秦文学与文化(第四辑)

赵逵夫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惠顿实业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313,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50

ISBN 978-7-5325-7890-0

I·2995 定价: 4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顾 问 饶宗颐 李学勤 裘锡圭 夏传才
 谭家健 崔富章 宋兆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长华	王 辉	王 锸	王震中
方 勇	方 铭	过常宝	伏俊琰
刘跃进	刘毓庆	池万兴	李炳海
汪受宽	张文轩	张崇琛	张新科
林庆璋	罗家湘	周玉秀	周建忠
郑杰文	赵生群	赵逵夫	祝中熹
贾海生	晁福林	徐正英	徐志啸
郭建勋	彭 林	韩高年	傅道彬

主 编 赵逵夫

执行编辑 马世年

目 录

- 秦汉兴衰:文化选择的决定作用 / 刘跃进 (1)
- 论甘肃早期文化同华夏文明的关系 / 赵逵夫 (10)
- 春秋执政卿与轴心时代的文化主体 / 梁 枢 (19)
- 《尚书·尧典》、《夏小正》和《月令》浅说 / 蒋南华 (23)
- 《彖》传的中位解《易》法 / 杨兰芳 (30)
- 子产年谱 / 韩高年 (40)
- 《左传》预言的多维考察及其意义 / 宁登国 (88)
- 庄子的语言哲学及表意方式(上) / 刁生虎 (99)
- “无为”思想发凡
——以先秦汉初的儒家和道家为考察中心 / 彭 华 (128)
- “温柔敦厚”与“兴观群怨”
——孔子“诗教”的特点及诗学观念 / 党万生 (145)
- 《硕鼠》庶民理想国生成的文化生态三论 / 郝建杰 (172)
- 读《诗经》札记 / 魏代富 (180)
- 《楚辞》校证(二十五则) / 王 伟 (193)
- 宋玉骚体作品对屈作的继承与新变 / 李城瑶 (202)

- 讖纬思潮与两汉诗歌创作 / 张峰屹 (210)
- 由白居易诗论其对贾谊不遇之关怀 / 孙永忠 (242)
- 推类而言:汉代乐器赋叙写模式探析 / 王欣慧 (266)
- 《古诗归》与《古诗镜》成书及体例探析 / 王雅辰 (290)
- 王褒《甘泉赋》、《洞箫赋》作年考 / 彭春艳 (300)
- 《古文苑》词语考释(二) / 伏俊琰 伏麒麟 (304)
- 古文籍语疑四题 / 祝中熹 (313)
- “阴厌”、“阳厌”考 / 瞿林江 (329)

秦汉兴衰：文化选择的决定作用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与振兴，需要综合实力来支撑。所谓综合实力，至少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力，或曰硬实力，如科技、军事、经济等方面，还包括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的无形实力，或曰软实力。硬实力就如同一个人的骨架，高矮之分，强弱之别，一目了然。但是，生命的意义在于活的灵魂。没有血液的流淌，没有精神的支撑，就没有生存的价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与振兴，同样如此。

关键词 秦汉兴衰 文化 选择

文化就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就是我们所说的软实力。它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于生命的感受，是这个民族和国家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秦、汉的兴衰更替，具体而微地说明了这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

这里所说的秦汉，是自秦王嬴政元年(前 246 年)始，其下限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前后长达四百六十余年。在这四百多年间，秦朝的历史非常短暂。秦王嬴政即位时十三岁，至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前后用了二十六年。他贵为天子时是三十九岁，自以为从此可以长治久安，故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可悲的是，他贵为天子不过十年就“驾崩”归天，他的儿子即位才三年，就为群雄推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秦帝国仅仅存在了前后

十五年的时间。即便是从秦王嬴政即位开始算起,秦代统一中国的进程也不超过半个世纪。而汉帝国的历史,如果从公元前 206 年汉高祖刘邦从自称为汉王算起,到汉献帝逊位于曹丕的公元 220 年,两汉历史前后长达四百二十多年。

秦朝为什么会如此短命?汉朝又如何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其中的经验教训,当时的文人学者就曾做过深刻的反思,后来的历史学家更是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阐释。在我看来,秦朝败亡的最深刻教训就是过于强化硬实力,而忽略了文化建设。

先秦学术文化,《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和汉初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并分为六派,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分为九流十家。尽管具体划分尚有差异,但是就总体而言,这些学派,多与地域有直接关系。儒、墨归为齐鲁文化,名、法归为三晋文化,阴阳、道德归为荆楚文化。秦汉思想文化的发展,与上述三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春秋末年,周朝统治者失去对天下的控制之后,文化教育事业逐渐走向民间。各种思想纷纷而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面对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秦国统治者面临着多种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多种文化选择。

秦人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政治需求,很自然地选择了法家文化作为自己立国之本。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孔子死后,其弟子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而子夏的弟子李悝则是法家的始祖,所著《法经》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秦人很快就发现法家文化的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果断地启用商鞅,以求变法。从此,法家思想成为了秦国的统治思想。正是依靠这种思想的指导,秦国得以迅速崛起于群雄之中,为日后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家思想崇尚武功,讲求实用,追求一统,一直被秦人奉为主导思想。这一思想的重要特征就是功利性,崇尚战功,寡义趋利。由此功利性在秦人那里又演变成一种强烈的排他性。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各家学说在相互融汇各家思想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在努力倡言与践行自己的主张,自然也会攻击对手。但在秦人那里,这种排他性表现得特别突出,不仅排斥其他学说,甚至那些倡言法家学说的人,也

在相互排斥，唯我独尊。选择这样一种过于崇尚功利性和排他性的文化，从根本上决定了秦帝国的过渡性命运。

对此，来自中原的吕不韦有着清醒的认识。《史记·吕不韦列传》及《战国策·秦策》记载，他在邯郸等地经商，结识了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国王子楚，并献上已怀身孕的舞姬。舞姬生子，即秦王政。子楚回到秦国，继立为庄襄王，启用吕不韦，先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不久，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讨伐，尽入其国。两周历史终于结束在秦相国吕不韦手中。在吕不韦看来，终结一朝的历史，同时意味着新朝的开端，这当然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历史大事。根据历史纪年成例，秦代东周的第二年，也就是庄襄王二年（前248），吕不韦把这一年视为秦据有天下的开始。^①庄襄王死后，秦王赵政继立，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此时的吕不韦，地位显赫，登峰造极。

这个时期，战国四大公子还有信陵君和春申君在世。信陵君为魏公子，春申君为楚公子。一南一北，占据文化上的优势，依然对于士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吕不韦要想真正实现他灭周以后统一中国的政治雄心，就必须扭转秦人不文的局面，将天下人才笼络到三辅地区。为此，他让门客各呈所闻，编为著作，号称《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吕不韦将其悬于咸阳城门，称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有点像燕昭王修筑黄金台，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表达了统治集团求贤若渴的心情。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秦人固有的传统，充分注意到稷下学宫各派的纷争与融合，对于各种思想，兼收并蓄。这种做法，有着莫大的感召力。史载，三千门客，一时聚集在吕不韦的周围。三辅地区俨然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

当然，吕不韦的主张不能完全脱离秦人的政治文化传统。《荡兵》倡导“义兵”之说，显然就是为秦人说话：“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

^① 《吕氏春秋·十二纪·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根据《尔雅》，太岁在“申”乃称“涒滩”。孙星衍《问字堂集·太阴考》以为应在始皇六年：“考秦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

之所自来者上矣。”秦国以武力横扫中国，吕不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但与此同时，编者对于那些特别偏激的言论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譬如对《荀子·非十二子》等就没有收录。更值得注意的是，吕不韦还对于士人寄予很高的期望。《孔丛子·居卫》引子思的话说：“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但是，他们没有对于“士”作具体分析。这一点，就与《吕氏春秋》不同。吕不韦对于“士”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但他要求的“士”，绝不是那种朝秦暮楚这样的游士，而是要讲究精神境界，如《士容》云：“士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其状肫然不僇，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属于大，似无勇而未可恐，狼执固横敢而不可辱害，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南面称寡而不以侈大。”这表明，经过长时间的战国纷争，人们已经厌倦了那种缺乏是非观念的纷争，而倾向于对国家一统、万众一心的强烈诉求。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如果秦国统治集团能够接受吕不韦的政治主张，改弦更张，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秦、汉的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的是，秦国的现实政治要求和历史文化传统，是不会轻易地接受吕不韦这样的政治主张的。从现实政治上说，秦王嬴政不可能容忍吕不韦这种容纳百川的危险做法。更何况，在秦王嬴政的背后，还有着更强大的秦国贵族势力集团，他们也不可能放任吕不韦这种延揽人才政策的实施，因为按照吕不韦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这些贵族集团的利益势必受到侵夺。事实上正是如此。就在吕不韦志得意满地完成《吕氏春秋》不久，秦王嬴政就逐渐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力。先是免去相权，后被迁往蜀地，并在秦王嬴政十二年被赐死。

《史记》记载，就在吕不韦被贬蜀地的这一年，韩国使者郑国访问秦国，向秦王建议修筑水渠。当时的王公大臣认为，这些说客来秦国，唯一的目的是为本国谋利。修筑水渠虽然对农业有利，却有可能对秦国的政治军事造成不利，秦王接受了大臣的建议，下令驱逐一切逗留在秦国的游士。

吕不韦的被贬和秦国驱逐游秦士人这两件事，似乎没有多少关联。但是时间是如此的巧合，我们不能不联想到这中间的因果关系。作为西游秦国的楚人李斯，原本是吕不韦手下的舍人，自然也在被逐之列。

他闻讯后，写下著名的《谏逐客书》。文章从秦缪公求士写起，写到秦孝公用商鞅，秦惠公用张仪，秦昭王用范雎等，反复阐述了客卿游秦给国家带来的各种好处。文章最后指出，倘若此时逐客，正中其它诸侯国的下怀，既给百姓带来损害，又会增加人们对秦国的仇恨，结果“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文章列举事实，推理严密，晓以利害，动以情理，秦王被深深打动，于是收回逐客令，恢复李斯的官位。从此，李斯逐渐取代吕不韦，而成为制定秦代文化政策的重要官员。

刘向《孙卿书录》云：“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作为荀子弟子、吕不韦部下的李斯，当然对稷下学宫各派的主张了如指掌。他少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絮，见人犬则惊恐万状，而官府粮仓的老鼠则悠然自得，由此感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他追随荀卿学习帝王之术，与韩非同学而自以为不如。学成后，考虑到楚王不足成事，六国又皆柔弱，便在秦王嬴政即位之初，西向入秦，成为吕不韦舍人，具体执行吕不韦的文化政策，为秦王朝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看到吕不韦的下场，李斯当然会明白一个基本事实：要想改变秦人的文化政策，必将付出沉重代价。《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记载说：“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对于秦帝的心理，李斯似乎心知肚明。他既没有吕不韦的雄厚财力，更没有“仲父”这样的特殊身份，他只能仰人鼻息，曲意逢迎。一方面，他为秦始皇寻仙求远的行为刻石纪功，邀宠买好。尤其是《史记·李斯列传》所载《上书对二世》一文，极尽谄媚之能事，摇唇鼓舌，矫言伪行。另一方面，他一改吕不韦主张，回归秦人急功近利的传统，将法家思想推向极端，焚书坑儒，^①为刚刚建立的统一

①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李斯作《议烧诗书百家语》，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翌年又下坑儒令。并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帝国强力推行钳制众口的愚民政策，^①也葬送了建立起来的大秦帝国。

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李斯的所作所为，确实难以理解。其实，他心里也非常明白这样做的可怕后果。他在《上书言赵高》虽极尽揭露批驳之能事，然为时已晚，不久即被系狱中，作《狱中上书》，正话反说，为自己鸣冤叫屈，然阶下之囚，已无回天之力。

西汉初年的思想家，在回顾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深刻地认识到，仅仅凭借强大的硬实力，席卷天下，并吞八荒，是可以“马上得天下”的，但是这种实力终究是外强中干，缺少凝聚力，更没有长久的竞争力。他们从秦汉交替的历史巨变中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的意义。不同的文化选择，可以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

与李斯不相前后的楚人陆贾，就主张在政治上的无为而治，^②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道理，自然为刘邦所嘲弄，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了这种主张的意义，于是要求陆贾著书，阐明秦何以亡、汉何以兴的历史根源。

从历史渊源上说，秦汉原本就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秦晋与法家密切相联，而汉朝统治集团则与楚文化及齐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秦朝灭绝文化的时候，素以文化自负的楚人扬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推翻秦人统治的重要武装力量均来自楚地。随着楚人入主三辅地区，很自然地，楚文化大举西移，进入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当时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与道家思想密切相关的楚文化，成为了一时首选。而道家的核心，则是南面帝王之术，而不仅仅是表面的清静无为。

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应当说这时的刘邦对于儒者还心存好感。公元前204年，酈食其向刘邦建议，欲立六国后人以树党，刘邦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派人

① 陆容《菽园杂记》卷1载无名氏《焚书坑诗》曰：“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授兵书。”

② 所谓无为，即用《老子》“我无为，民自化；我好静，民自正”。

刻印。而张良预设八难，从形、势、情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可立六国之后的道理，颇有振聋发聩之势。史载，刘邦正在吃饭，听到张良的鞭辟入里的分析，“辍饭吐哺，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趋销印”。张良这件事情给刘邦较深刻的印记，从此不再信任儒生。^①问题是，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此距酈食其事件不过两年时间。刘邦的困惑，最终由来自鲁国的叔孙通给予圆满的解决。叔孙通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及朝廷中有学问的人，因秦旧制，制礼作乐。儒家文化在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儒、道之外，汉朝统治者对于法家同样重视。《论衡·效力篇》说：“叔孙通定仪，而高祖以尊，萧何造律，而汉室以宁。”叔孙通的儒学已如前述。所谓萧何造律，系指其《九章》之律，亦大抵因秦旧制，包括：《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等。其中，与文化相关的内容主要见于《汉书·艺文志》中一段话：“汉

① 《汉书》本纪：“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与酈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欲立六国后以树党。汉王刻印，将遣食其立之，以问张良，良发八难。汉王辍饭吐哺，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趋销印。”此八难，详见《汉书·张敖王周传》：“臣请借前箸以筹之。昔汤武伐桀纣封其后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闾，式箕子门，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财，以赐贫穷，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毕，偃革为轩，倒戟干戈，示不复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马华山之阳，示无所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复输积，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国后，唯无复立者，游士各归事其主，从亲戚，反故旧，陛下谁与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强，六国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诚用此谋，陛下事去矣。”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40页和第2029—2030页。

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古文、奇字亦在其中，汉赋大量出现奇字，或与此政策有直接关系。《汉书》还记载，石奋上书，写“马”字少一笔，惊恐万状，甚至以为要“获谴死”。^①由此可见当时法律的威慑力量。明代古文家盛称“文必秦汉”，秦汉文章，特别是应用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字字斟酌，句句推敲，倘若脱离这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一切不过皮相之谈。

萧何制律，本于法家；叔孙通制礼，悉依儒术。西汉初年的统治者，虽然生长在荆楚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对于儒、法两家学说，采取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经过近百年的探索，两汉思想家和统治集团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建设必须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表面上看，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在实际操作中，采取的是一种外王内霸的政策，王道的宗旨是儒术，而霸道的核心则是法家，这正是西汉统治思想的根本所在。这就较之吕不韦的博采旁收，泛滥无归，有了更加具体的指向。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宣帝明确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②所谓“俗儒不达时宜”，与吕不韦所说的“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真可谓是意会心谋，殊途同归。可惜秦朝没有接受吕不韦的主张，国将不国，而两汉统治者正是从这种历史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文化选择的意义，努力强化综合国家实力，造就了两汉四百年辉煌的业绩。

孤立地看，文化也许并不能解决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温饱问题。但是，从秦汉兴衰的历史嬗变中不难看出，文化的取舍，却决定着一个

① 《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载：“建为郎中令，奏事下，建读之，惊恐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获谴死矣！’”颜师古注：“马字下曲者为尾，并四点为四足，凡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96页。

② 《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民族、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的根本命运。

■ 作者简介

刘跃进(1958—),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研究。

论甘肃早期文化同华夏文明的关系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 甘肃省极为重视文化建设,于2012年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战略方针,着力打造“一带”、“三区”、“十三板块”。甘肃的文化宣传研究和传承、创新建设过程中,有五个方面的文化要素应该重视:一是以伏羲文化、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始祖文化,二是先周文化,三是早秦文化,四是丝绸之路,五是氐羌文化。我们要从整体性、系统性、源头性的角度对甘肃历史文化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努力。

关键词 文化建设 始祖文化 先周文化 早秦文化 丝绸之路文化 氐羌文化

在刚刚跨入新世纪的时候,甘肃省提出建设文化大省,但是怎样建设,通过什么步骤,从哪些方面发展,还不是很明确。2012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战略方针,并具体化为围绕“一带”(丝绸之路),建设“三区”(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打造“十三板块”。这个战略规划既具体、明确体现了对甘肃文化源头性特征的重视,也包含了对甘肃文化融合性特征的关注。特别是侧重源头性这一点,可以说是抓住了关键中之关键。今年元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复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2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发布会。这不仅在甘肃的文

化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全国文化建设方面说,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几十年来,我们在文化宣传和研究方面确实取得很大的成绩,突出的如敦煌学方面。但是,对甘肃文化的源头性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推动作用关注得不够。国务院批复甘肃省提出的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计划,不仅为甘肃文化的发展、学术的繁荣提出一系列大课题,也为甘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我认为今后甘肃的文化宣传和研究一方面要关注那些能够显示在全国有影响,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要素;另一方面,要关注那些能够把历史文献中零星记载的传说、遗址等贯穿起来的文化要素。也就是说,从哲学层面说,既看到整体性,看到很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也要考虑到相关文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才能从时间、空间两方面立体地、系统地展示出悠久而丰富多彩的甘肃历史文化,而避免传承、保护、建设中的失序、失衡、缺漏及历史展示中的相互抵触。

我认为甘肃在文化宣传研究和传承、创新建设过程中,有五个方面的文化要素应该重视。

一是以伏羲文化、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始祖文化。虽然说各种考古报告和对史前遗址与出土文物的研究很多,对与伏羲有关系的“八卦”、《易经》的研究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但联系有关文献记载、联系各种遗迹、遗址、民俗及上古民族史对史前阶段甘肃历史的综合研究,尚缺乏像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那样的力作。既不能简单的比附,也不能永远是文献与考古两张皮。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的空白点,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完成。要做全面、扎实的探索。

二是先周文化。弃是周人第一个男性始祖。据传统文献记载的周人活动踪迹,周人发祥于陕西中西部的渭水一带。从钱穆至当代美籍学者许倬云的部分有影响的学者认为周人起于晋东南,然后越吕梁山进入陕西境内。但这主要是从历史地名入手,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近几十年,在靠近甘肃的陕西长武县发现的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有居住址约 7000 平方公里,墓葬 230 多座,又发现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品